

# 权威与依附:一个晋商村落的现代化进程

□ 郭永平

[摘要] 选取了介休大靳村这样一个晋商村落,将其置于其所处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力图展示出20世纪以来村落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权威与秩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阐述了晋商时代形成的依附关系对于村落转型的影响。认为明清时期,晋商在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商业的奇迹。在晋商村落中,富商巨贾与佣人之间因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依附关系。

[关键词] 大靳村;晋商文化;乡土权威;依附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5)02-0077-07

## Authority and Attachment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a Village of Shanxi Merchants

GUO Yong-ping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n Dajin Village in Jiexiu city under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trying to reveal changes in the land authority and order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also expounds the impact that the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formed in Shanxi merchants' era has on rural transformation. Merchants of ancient Shanxi created a commercial miracle in a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formed in the dry land of the northern plateau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e villages of Shanxi merchants, a kind of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was formed between the exceedingly wealthy businessmen and their servants due to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Dajin Village; culture of Shanxi merchants; land authority; attachment relationship

### 一、问题的提出

山西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晋商还在黄土旱塬的农耕文明中创造了商业的奇迹。然而晚清以来,晋商败落了,山西落伍了,山西何以失去曾经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与明清以来山西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出现的人口、资源、环境紧张有关,同时也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有关。山西的落伍是与晋商的败落相伴而行的,通过对晋商的研究可以反思山西乃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这样一个“李约瑟之谜”。

山西历史上是一个移民社会。<sup>[1]</sup>大靳也是一个移民村落,不过移民来到这里应该与其独特的地理

位置有关。大靳东依山梁,南面、西面、北面均是深达几十米的黄土丘陵沟壑,这为预防匪患创造了天然的条件。晚清时期,北方村落规模多为中型村落。百户以上大村不占多数,为安全需要,若干村落环筑土墙或设立“庄门”。<sup>[2]</sup>大靳也是如此,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的发达,村落逐渐富裕,依凭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巨商大贾出资修筑了堡墙。在这样一个外部封闭、内部开放的宗族社会里,晋商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可以避免因匪患而遭受损失。不论是从民间传说还是村庄中保留的族谱都可以看出,正是明清以来,许多民众移居大靳。在此情况下,村落人口增多,规模增大,形成了一个区域中心。

不过大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何时,并没有一个详细的答案。《介休市地名志》是这样记载的:

相传靳氏弟兄俩最早在此处定居,分住沟之南北。后逐渐形成两个村庄,因该处初为兄者所住,故定名为大靳。<sup>①</sup>

以上仅仅是传说,大靳村中现存最为古老的建筑是大兴寺,寺里大梁上有“大元至贞七年三月初二日寅时上樑大吉”的题记,不过元代并没有“至贞”这个年号。明代的县志已经散佚,现在能看到的是清代康熙三十五年(1696)的《介休县志》,在“南乡 26 村”里面就包括大靳村和小靳村。

大靳第一大姓王姓自称是灵石王家的发祥地,相传在唐朝贞观十三年(639),陕西省华阴县王增、王立、王光三兄弟为了谋生开始向山西迁徙,其中王光定居在了汾阳,另外两兄弟王增、王立则来到了介休,定居于大靳。清朝康熙年间,王姓家族依靠经商积累了巨大财富。发迹后,开始着手修建祠堂,整理编写族谱。王氏族谱也只能从 40 世开始算起,到今天已传了 50 代。<sup>②</sup>

郭姓是第二大姓,郭氏家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掉,更是难以追溯其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只可以上溯到清代:道光八年(1828),介休县大靳财主郭建馨创建竹风园晋剧社班。郭建馨去世后,由其侄儿郭寿光续办,有记载最晚的演出时间是小靳村东岳庙戏台咸丰七年(1857)的题记。<sup>[3](P633)</sup>介休民间流传“介休有个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的说法,侯奎、灵哥、二大王分别指的是光绪年间介休北辛武村的侯奎、北贾村的冀惟聪、大靳村的郭可观三个纨绔子弟。能与晋商八大家之一的侯家少爷灵哥冀惟聪比肩,可见当时大靳郭家的实力也相当雄厚。光绪四年(1878),介休邑绅郭可观提倡蚕桑,置北坛地 120 亩作桑园,并在南街设立丝织机房。<sup>[3](P764)</sup>

然而,历史上的繁华并不代表今天仍然兴盛。走进大靳村的时候,有三个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第一,在常住人口为 230 人的村里就有 30 个光棍;第二,乡村小贩喜欢来大靳叫卖;第三,生活较为慵懒。周边村民将大靳人的生活概括为“吃饭、睡觉、磨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曾经的晋商村庄为什么成为今天这样的状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到区域社会的历史中去。

权威产生于人们对统治的服从,本质问题在于其合法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对权威进行了历史的考察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经典权力理论——三种权威类型,即:克里斯玛型权威、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韦伯认为,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三种权威类型的转换。<sup>[4](P241)</sup>

20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秩序与权威格局发生过三次

大的变化:第一次是清末民初国家“政权的下沉”过程中“权力的文化网络”遭到破坏,士绅群体逐渐退隐;<sup>[5]</sup>第二次是新中国建立后在人民公社时期“全能主义”政治生态下,通过国家的授权,形成了一种建构主义权威;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乡村社会呈现出有权力无权威的状态。大靳村的秩序与权威也经历了这几个阶段。在调查中村民把权威理解为一种威信,而威信与人格的长期积累有关。

## 二、传统社会晋商的繁荣： 佣人与财主间的依附关系

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〇)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山西有人口 403 万,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加之明弘治年间九边重镇的设立,都为晋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晋商从商之风也渐渐地吹入了大靳村,一些有胆识的王姓后裔跟随山西平遥的商人外出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这批人开始发迹。他们回到大靳后,就开始买房置地、修桥补路,捐建庙堂。随着外出经商者的增多,村庄财富的积累,大靳的社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以本村商贾为首的社会秩序也悄然形成。康熙年间王氏宗族集资修建王氏祠堂——公悦堂,而祠堂的建立对于稳固宗族社会具有重大作用。在乾隆年间,大靳的“东王”支系开始发迹,不仅在山西太原开有自己的当铺和票号,甚至还将自己的商业范围扩展到了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大靳村进入了最为繁华的时期。

### (一)村落规模扩大

大靳村的王氏宗族发迹以后,开始修筑堡墙,建造房院,形成了永宁堡(旧堡子)。后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王姓晋商在永宁堡附近又修了一个新堡子,也就是现在依然存在的崇宁堡,堡子里的所有大院都相互连通。乾隆年间,在堡墙的五個大门上架起了土炮,以防止土匪的骚扰,同时村内还建有与外界相通的地道,以备急用。进入西门就是东西向的主干道,清代在主干道两旁共有 24 家商铺,可见当时的繁荣程度。王氏家族还在村中建了六座寺庙和一座楼,分别是龙王庙、菩萨庙、大兴寺、五道庙、山神庙、真武庙和魁星楼。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村落的信仰是多元的,包含了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在大靳的建设过程中,村里的王氏宗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道光年间的王登元为例,根据村内残存的碑文记载,道光十六年,在修缮菩萨庙的过程中,仅

① 介休市地名志编辑委员会:《介休市地名志》(内部资料),2011。

② 王兴兵:《介休市大靳村王氏家族回忆录》(打印稿),1998。

他一人就捐银五百两。道光二十二年，在修缮魁星楼的过程中，他又捐银四十两。可见当时王姓晋商对村落发展的巨大作用。同时东王支系还在村内建立了私塾，以供族人子弟教育之用。<sup>①</sup>大靳村在乾隆年间就基本上形成了集防御、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于一体的社区了。

## （二）成为经济中心

由于大靳村商贾云集，生活便利，自清代一直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是周围村落的经济中心。每逢过年过节，大靳就会变得热闹非凡。正是因为其富有，村落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吸引了周围村落的财主迁移到大靳居住。如从小靳村迁移而来的陈姓和陶姓，西欢村迁来的罗姓，北辛武村迁来的冀姓，焦家堡迁来的焦姓和张姓，董家庄迁来的宋姓，以及陕西迁来的杨姓。除此而外，由于商业兴盛，大靳还出现了许多依附于商人的其他职业，如手艺人、镖师、佣工等。佣工里面就包括厨师、清洁工、园艺工、车夫、奶妈，等等。<sup>②</sup>

从小靳村迁移而来大靳的郭氏宗族在介休历史上也颇有名气。清代光绪年间，号称“二大王”的大靳乡绅郭可观在全国很多地方开有商铺、票号，还开办了印刷厂，他以义行闻名乡里。<sup>[6](P307)</sup>郭氏家族的佣人就有几百个，且这些乡绅对待佣人很好，相比起周边其他村落，佣人们的生活条件也较优裕。访谈中村民说是有钱人养活了穷人。

## （三）乡绅成为村落的权威

雍正二年，里民捐谷九千七百余石，在介休设置104所义仓，其中就包括设在大靳大兴寺的义仓。<sup>[6](P218)</sup>光绪十五年（1889）大靳王家第43世王丽中中举人，后为辽州学正。<sup>③</sup>在清代，村里还出现了很多有声望的财主，如道光年间的王培元、王登元，光绪年间的王家鹤、郭可观。

王家鹤属于“东王”支系第41世，其堂名为王“二酉堂”，在他接手家业的时候，实际上家族已经开始败落。但是由于他聪明能干，善于和官府打交道，还捐得了资政大夫正二品红顶商人的官职，依仗着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王家鹤成为当地较有声望的乡绅。据记载：“（王家鹤）出入县城衙门，七品县官也得出庭迎送，坐轿乘车过路，沿街行人回避，概无阻挡。一般官员来村拜会，只能在‘不窥园’<sup>④</sup>上层的小客厅等候，并通过侍从先生或佣人传话后，才会接见。”<sup>⑤</sup>可见王家当时的地位与权势。

同时，以王家鹤为代表的乡绅势力还充当了“保护型经纪人”的角色，村中族人遇到官司诉讼，都请他出面进行解决。所以村中也流传着很多他依仗自己影响来保护族人的故事。

相传在光绪年间，大靳的王姓族人运煤时和焦

家堡的人发生了争斗打了起来，结果大靳的人失手将焦家堡的人打成重伤，双方闹到了县衙。为了赢得官司，焦家堡把在太原绿营当营长的余二麻子请了过来，大靳村就把王家鹤请了出来。最后县衙经过权衡，还是做出了有利于大靳村人的判决。

在传统的村落社会，并非有钱、有权就可以成为地方权威。“地方权威的权力地位获得与三个因素直接有关：财富、学位及其在地方体中的公共身份”。<sup>[7](P19)</sup>无疑，王家鹤完全具备这样的要素。在宗族社会里，权威的树立除依靠家族的庞大、经济的发达外，肯于仗义执言，为民办事也是权威树立的重要条件。再者“权威是通过给予来获取的，可以通过公立事业来创立民间权威，这是一个交换的过程”。<sup>[8](P260-261)</sup>上文谈到的王培元、王登元、郭可观等晋商，不论是建村还是修庙都慷慨解囊，这些做法对于权威的树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晚清现代化的过程中晋商衰落，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晋商退出了历史舞台。从内部来说，晋商的衰败与后代不思进取，生活也越来越奢侈有关。另外随着鸦片流入山西，大靳的财主们很多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受战乱影响，晋商在全国各地的生意受到了重创，经商者不得不回到村里。但是村里也并不太平，1938年日军进入大靳，抢劫村庄，火烧公悦堂和四十多处宅院，大靳村内的很多店铺纷纷停业。许多财主逃离乡村，乡绅社会走向没落，原有的依附于财主而形成的村落社会趋于解体。

## 三、集体化时代的典型： 民众依附于组织

现代化的进入，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因为“文字下乡”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表现。<sup>[9](P16)</sup>光绪二十九年（1903）介休县知事陈模根据“钦定学堂章程”将绵山书院改建为介休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介休邮政局在县城北大街设立；民国2年

① 大靳村大兴寺西墙上的碑文。

② 这样的依附关系在其他晋商村落也普遍存在。如祁县乔家在民国年间仅佣人就有250多人，太谷曹家仅护院家丁在1900年就有500多人，榆次晁店王家1921年时有佣人200余人。殷俊玲：《盛世繁华——晋商与晋中社会叙事》，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③ 介休市教育委员会：《介休教育志》，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1992。

④ 清代王氏家族私塾被命名为“不窥园”，访谈中村民说“不窥园”就是不要窥视，以免影响学生读书。而据王充《论衡·儒增》记载：“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窥园菜。”是说董仲舒年少时读书非常刻苦，虽然他的书房紧靠着花园，但他三年没有进过花园，甚至都没有看过一眼。用“三年不窥园菜”来形容董仲舒专心学习，不被外物干扰。

⑤ 王兴兵：《介休市大靳村王氏家族回忆录》（打印稿），1998。

(1913),知事陈绍虞创办女子高等学校;民国6年,阎锡山在各村建立村公所;民国23年(1934),山西省银行介休寄庄成立,南同浦铁路太原到介休段通车。<sup>[3](P764~766)</sup>民国18年(1929),介休第四高级小学校在太新创建。其原因是“大家公认太新居二区中心,附近各村的初级小学基础较好,学生有来源,该村西门口的文昌庙略加修建就可以占用,附近地势宽阔,将来又有发展余地”。<sup>[10](P59)</sup>随着“传播媒体、交通、邮电等资源的开发,国家更容易快速地渗透到社会中,进一步强化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监督”。<sup>[10](P214~240)</sup>

传统社会权威与秩序格局在民国时期已经走向了下坡路,不过在1939年时太新村政权仍然掌握在乡绅手里。<sup>①</sup>1949年,介休县开展了土改运动,地主和富农迅速被边缘化,乡绅作为一个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社会所提倡的道德伦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党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大队作为一个行政组织开始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在形塑乡村社会秩序中具有了决定性的力量。原有的对于财主、地主的依附也转移到了对于干部,对于党组织的依附。

#### (一)土改运动——村落权威的重构

1949年,县里组织工作组进入太新开展土改运动。村里王氏家族中最有钱的财主闻风外逃,但后来大都陆续被抓回村里批斗。和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运动一样,太新的土改运动也大致可分为发动群众、丈量土地、评定土地等级、划分阶级成分、批斗地主富农、分土地分浮财几个环节。

土改前许多来太新居住的农民并没有土地,主要是常年为太新财主服务的。因此从人均土地占有看,当时太新的贫富分化还是比较严重的。不过,因为村里很多都是仁德财主,在土改一开始村内的斗争并不激烈。通过挖苦根、忆苦思甜、诉苦等方式,尤其是上面派来了工作队后太新的底层民众被动员了起来。根据原大队支部书记胡守福回忆,土改时期总共划分了十户地主和三户富农。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家庭,不仅在经济上受到了冲击,精神上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笔者进行访谈的时候,很多以前被划为地主、富农阶级的后代在谈及那段历史的时候潸然落泪。在土改中富农本来是中立的对象,然而在大新却被视作斗争的对象,财产、土地都被瓜分,当时被划分为富农成分的陶大旗跳井自杀。据说是陶家正处于财产积累阶段,对于穷人较为苛刻。在这种情况下,太新原有的权力结构彻底瓦解,旧政权的统治者——乡绅和财主在经济上被剥夺、政治上被打压、道德上被否定,有的甚至在肉体上也被消灭,取而代之的是那些旧社会的“下等人”。从张兰逃荒到太新地主家当长工的冯步根被任命为太新农

会主席,贫农出身的王来宁被任命为村支书。党组织深入村庄极大地改变了村庄权力结构,尤其是旧社会中苦大仇深的下层精英被国家赋予其权力后,这些边缘人物真正掌握了村庄权力,通过运动的方式,权威逐步被树立起来。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乡村秩序的重塑

土改后,很多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从此以后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土地了。依赖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人民公社化运动马上就拉开帷幕了。1956年秋天,太新根据自愿原则组织部分农民成立初级社,随后1958年升级为高级社,农民都入社了,包括土地、牲畜等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太新也改为太新大队,全村按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情况分为了四个小队(1974年又合并为两个小队)。当时全村的生活动由大队支部书记和大队长来负责,小队长负责本小队的具体生产,同时每个小队还有妇女队长来管理妇女的生产,各小队的记工员来负责统计工分。大队还配有专门的会计和保管员,来对大队生产情况进行核算和对财产的保管。可以看出,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大新村建立起具有高度国家控制力的行政体系。

在具体生产方面,全村所有的劳动力都要集体下地劳作。当时主要按工分进行粮食分配。每人每年可以分到360斤左右的基本口粮,当时有句顺口溜就是“够不够,三百六”。实际上,村里产粮不少,主要是上缴国家了。相比较而言,干部的生活还是好于一般群众。因为虽然经常外出开会,但是干部有补贴工分。例如,在1974年,太新村革委会副主任郭双有、温志进这两个半脱产的村干部的工分补贴每人就可以达到110个。<sup>②</sup>

人民公社时期,民间精英层被消灭了,一切资源和权力都集中于国家机器。人身自由也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农民不能以个人名义外出打工,外出打工只能以集体的名义由人民公社进行派遣。“一方面社员对集体的隶属和依赖具有终身性和不可剥离性,另一方面是集体对于社员的荫庇与控制。而集体对于社员的控制和社员对于集体的服从,这与集体掌握着社员的生存资源有关。不仅掌握着资源的分配,还掌握着改变命运的机会。”<sup>[11](P128)</sup>

#### (三)大寨式典型的诞生

大寨式典型是通过政治运动树立起来的,太新干部紧跟形势,太新村民就紧跟干部,太新也被树立

① 介休市文史资料委员会:《介休文史资料》(第1辑),1988。

② 太新村民王敏书是人民公社时期二队会计,2009年逝世后,村里的部分档案就由他儿子王玉基保存着。

为大寨式的典型。

1964年5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了《关于昔阳县大寨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要求全省普遍学习并加以推广。大寨评工记分秉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是“大寨工”。这种评工制度的管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超经济的外力,去维持集体劳动的‘积极性’”,而这个“超经济的外力”包括很多因素,如政治态度、人际关系。<sup>[12](P440)</sup>大靳也学习大寨的方法,村民的自留地全部收归队里,按“评工记分”分配粮食。由于大靳靠山,可以开荒修梯田,相比起周边村落,大靳人生活水平较高。到了1980年,大靳村的日工分值为2元,这与全国典型的大寨当年的工分值是一样的。那时周边村庄如小靳、万果村的日工分值基本上在1元左右。谈到这段历史,大靳村人常常引以为豪。不过,当时管得太死,用村民的话说就是“群众的生活都攥在干部手里”。村民的生产、生活等大小事宜都由生产队直接管理,对于村民来说,生产队队长就是他们的大家长。每天早上,生产队长要招呼社员出工,给社员分派任务,出工时有专门的记分员记工分,晚上队长召集社员开会,给每位社员评定工分。在此情况下,个人的劳动报酬与消费品分配均与劳动工分相挂钩,生产队掌握了每一个社员的经济命脉。在国家的全面控制下,村民通过依附于组织而依附于国家。

1967年11月8日,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来到介休,在西关广场发表讲话。当时村里的干部步行去听陈永贵介绍大寨经验,回来后连夜传达。大寨修梯田,大靳也学大寨修梯田。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大靳干部就派民兵将土改前逃到太原的两个地主抓回来连夜进行批斗,并且将其家人也揪回村里,进行劳动改造。村内还掀起了揭露举报走资派、当权派和阶级敌人的运动。由于揭发举报之风盛行,很多政治成分不好的村民也开始人人自危。1975年11月,介休县召开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农业学大寨会议。1977年2月,县里抽调三百多名机关干部去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sup>[3](P780)</sup>同时,大靳的支部书记胡守福还被派去大寨村进行“取经”,回来后在村里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大靳的政治工作常抓不懈,如为了加强对村民的思想改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村民都要求背诵毛主席语录,甚至有时还有红卫兵在村口站岗,凡是劳动回村的村民都要背毛主席语录,背不过的不许进村。

传统社会里大靳村的秩序是通过乡绅这样的精英阶层而在普通民众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集体化时代,国家的控制势力渗透到了村落的各个层面。此时乡村的权威是国家所赋予的,乡村的秩序主要是

建构性秩序。人民公社时期,一系列极端化运动的推行,同时也是各种现代性因素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进入村庄的时期。然而,由于受极左政治理念的影响,这种极端化的现代性对于农村的生产生活管得过严过死,农民成了劳动的机器。尤其是在大跃进的吃公共食堂的时代,更是引入了一种军事的乌托邦,农业学大寨就是在推进这样的乌托邦理念。大靳是大寨式的典型,除了晋商社会所延续的“听话”积习外,也与政治运动的推动密不可分。也正是在不断的运动中,乡村社会经历了秩序与权威的重构。

#### 四、改革开放时期:

##### 从“先进村”到“落后村”

改革开放消解了以革命为旗帜的极端现代性运动对地方社会传统所实施的强制性改造,在此过程权威无法再通过国家的赋予而获得合法性。大靳也是如此,在权力格局的建构、权威的重构过程中,大靳原有的依附关系消失了。

##### (一)现代化与村庄衰落

上文谈到了在传统社会时期,乡绅成为村里的权威,以及晋商村落中佣人与财主间的依附关系。土改以后,乡村政治呈现为党的一元化权力结构,民众通过依附于党组织而隶属于国家。1981年,介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也从对于干部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除农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外出打工者开始增加。村民人均收入也开始提高,生活水平已明显改善。1983年12月,县委、县政府命名大靳等4个村为第一批文明村。<sup>[3](P782)</sup>这可以说是大靳最后一次获此殊荣。

2000年大靳乡被撤销,乡政府搬迁到了绵山镇,从此大靳失去了行政中心的地位。随之隶属于原大靳乡的七站八所也搬迁到其他地方,尤其是医院的搬离,中学的合并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如今的大靳村,很多年轻人早已在城里务工、买房,适应了城市的现代生活。村里剩下的主要就是光棍和“九九部队”(老年人)。大靳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充当着周围村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农业学大寨时期关闭的市场也重新开放了,一些流动商贩再次活跃于乡村社会。介休许多小商小贩每天第一站就是来大靳,原因是大靳村“杀货”。俗称“大靳人装富,小靳人抠门”,意思是说大靳人虽然存款不一定多,但是村民出手大方,有钱就花了,而不像小靳村人一样将钱攒起来。所以,小商小贩更愿意来大靳而不是去小靳等其他村落。改革开放后拥有了人身自由的村民生活方式也现代化了,他

们可以通过电视机、电脑、手机等多媒体获取外界的大量信息,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因此可以说,信息和交通的便利正在改变着村民的生活。村落不仅是建筑的实体,同时也是地方文化、地方精神的物质体现。<sup>[13](P2)</sup>然而随着这些晋商后代离开村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栋栋孤零零的建筑,长满了荒草的院子,早已生锈的铁锁,作为地方文化、地方精神载体的村落正在衰落乃至终结。村里偶尔也有短暂的热闹,那就是2001年修建大运高速公路和2011年修建大西高铁的时候,许多民工在村里租住和吃饭。这些民工在给寂静的村庄带来了喧嚣的同时,也给村里人提供了很多商机。然而热闹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工程完工后,工人撤离了村庄,村庄再次陷入了冷清与萧条。一般来说,村庄最热闹的时候有两个时段:一是婚丧嫁娶这些人生礼仪的举行;二是村里的换届选举。尤其是村委会换届,想要进入村委会班子的村民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如家族的、亲戚的、朋友的关系来参与投票。

#### (二)最后的“大家长”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实施,集体化时代以来由上级指定干部的做法发生了变化,意味着村落权威经历了从传统型权威到法理型权威的转变。从《组织法》来说,村落由符合条件的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的做法实现了亘古未有的民主,而事实上这样的选举民主在中国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当下村落的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之间的较量,且由于贿选问题屡屡发生,选出来的干部有权力无权威。

大新村这个晋商村落最后的“大家长”宋玉龙的干部生涯是从集体化时代延续到今天的。不过其传统的克里斯玛型权威严重弱化,法理型权威却又无法树立起来。从宋玉龙的人生经历看,完全符合克里斯玛型权威所应该具备的特征:他生于1951年,祖籍是绵山镇城寺村,宋的父亲在解放太原的战斗中牺牲,从小跟随母亲来到大新。他文化水平不高,只读过小学五年级,但却很有头脑,办事干练。21岁被大队推荐到县城学开拖拉机,27岁任副大队长,28岁被提拔为大队长,35岁担任支部书记。加之宋玉龙是烈士子女,当时村民们对这个年轻的村支书有很高的期待。宋玉龙的思想观念形塑于集体化时代,因而在担任村干部时候依然是公社时期的“家长制”管理方式。然而,他在村里的威信一落千丈却与选举有关。

从1998年以来,大新共举行过5次村民委员会选举。不过,2005年以前的选举主要是由乡镇指定,所以并未进行过真正的动员。大新村真正意义上的基层民主选举总共开展了三次,分别是2005

年、2008年、2011年,在大新村民们看来正是这几次普选“搞坏了村里的风气”。2010年,由于大西高铁的修建,大新村的旧堡子被整体拆迁,涉及村里九十多户村民。高铁的修建必然涉及征地补偿的问题,受利益的驱动,2011年的村委选举竞争比往届更为激烈,出现了贿选的问题。宋玉龙在家族势力的支持下,最终连任,但他曾经的权威却从此一落千丈,村里人虽然在选举中收获了实在的好处,但在内心里却认为“现在的干部选举花了几十万,以后肯定要捞回来”。

宋玉龙虽然如愿当上了村主任,但却不得不面对竞争对手持续不断的反对浪潮。各种针对“大家长”的流言蜚语甚至上访事件不断,在大新主政近三十年的“大家长”宋玉龙如今住在城里,村里大小会议不再参加,属于村委会的事情就更“没有人管”了。现在,村委会基本上陷于瘫痪状态,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一般不回村里。以至于我们在大新调查的一个月中只见过他一次,那次还是为了迎接市里卫生检查,且有镇党委书记亲自坐镇,他才回到村里。

### 五、进一步的讨论:权威的丧失与村落的衰败

在大新村,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绅来治理。不同于完全以农为业的村庄,这样的村庄因为晋商的发达,村落的扩大,人口的增多,村庄中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在这里并没有成为两个群体之间的主要关系。在晋商村落里,由于商业发展,村落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商业的反哺。加之许多仁德财主的出现,致使佣工与财主之间经济上、人身上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不仅财主富有,村里服务于财主的佣工家户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周边村落仰慕的对象,村落记忆呈现出的是财主与佣工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民国年间,在内外交困中,晋商纷纷破产,大新的王氏、郭氏家族也不例外。大财主逃离家乡,奔赴城市,中小财主继续留在村里,但是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与传统性权威衰落相伴而行的是政府代理人在村落公共空间的地位日渐上升,村政与学校的建设是现代性进一步加深的表现。1949年,介休进行了土改,大新村土改并不激烈,大多只是走走过场,成分高的人大多并没有遭罪,因为人们还是记得财主的好处。这时候乡村政权也转移到了村干部手中,村干部是由政府任命的。不过因为其产生于乡土社会,村干部经常寻求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普通村民来说,长期以来习惯于被领导,在晋商时代,村落民众与财主之间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关系转化为心理的依

附,尤其是在当时晋商村庄的经济条件确实比周边村落好,这种状况使依附关系进一步增强。民国年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晋商不断败落,但是并未完全退出村庄权力核心。新中国成立后,在乡村秩序与权威的重构中晋商彻底被边缘化。不过,曾经形成的依附关系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对于民众来说,只是将传统时代对于财主的依附转移到了对于党的依附。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靳是公社所在地,大靳人以“听话”“好管理”而博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领导说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加之土地多,卖粮多等原因,大靳大队被树立为大寨式的典型。头顶上拥有了象征性的光环后,更加强了村落民众对于组织,对于国家的高度依附心理。改革开放后,大靳人仍然不断诉说着晋商时代繁荣,迷恋于农业学大寨的光环,也就是在恋旧的过程中,村落经济徘徊不前,许多家户连传宗接代都成为问题。在“守土困难、离土不易”的艰难抉择中,一些年轻人不得不离开村庄,导致了村庄萧条,随之民众与干部间的依附关系也减弱。进入 21 世纪以来,出现了贿选的事件,作为法理型权威的干部事实上只有“权力”没有“权威”,村落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作为一种生存策略,闭塞的地理环境能够避免来自外来力量的冲击,这在冷兵器时代尤其重要。也正是缘于此,有产者为了保全自身的财产不被匪患掠夺,许多村庄都建有堡垒一样的防御体系,大靳村也是如此。借助易守难攻的地理特征,许多移民迁移到这里,加之明清时代郭姓和王姓这样的晋商家族财富的积累,对村落的经营,大靳成为富甲一方之地。然而,地理环境的闭塞也是一把双刃剑,再加上近代以来被设计的现代化,如现代科技对传统农业的革新,教育、科技等现代性要素对于传统村庄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根本性改造,<sup>[11](P145)</sup>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理念的形。也正是这一理念的驱使下,乡村的萧条、衰落自然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重要命题。这对于长期保有依附心理的大靳人来说,由于受晋商时代形成文化惰性的影响,在现代化过程中快速衰落也是自然的事情。如今的大靳早已丧失了往日的繁华,村内再也看不到乡绅时代 24 间沿街铺子了,也很少能看到人民公社时期作为行政中心的政治印记了,只是那长满荒草的老宅、被盗的石鼓、被打碎的石狮、去除神像的庙宇,这些历史的遗迹都向我们诉说着村落曾经的繁荣和曲折的历史。昨天的辉煌并不等于今天的繁荣,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成为后天发展的包袱。大靳人在改革开放后保守的思维方式,慵懒的生活习惯,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甚至连田地也种不好,这样的现实表现不仅是由闭塞的地理环境造成的,更与在晋商时代长期依附惯

习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惰性不可分割。在今天,现代商业、现代贸易等都是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是在现代性的成长过程中,乡土社会原有的权威模式弱化、衰落,甚至消失了。没有了权威的村落社会就一定现代化了吗?现代化的本意是去除传统对于个性的束缚,使个人更好地发展。然而,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却并非我们所希望的那样。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乡村年青一代中“狭隘的个人主义,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落、信仰世界的坍塌等社会事实的存在”,<sup>[14]</sup>证明了丧失权威的村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非那么和谐。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发展更为和谐,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致谢:本研究的选题得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的启发,在材料收集过程中也得到了周教授学生蒋志远、廖越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 参考文献

- [1] 安介生. 山西移民史[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 [2] 王庆成. 晚清时期华北村落[J]. 近代史研究,2002,(3).
- [3] 介休市志编撰委员会. 介休市志[M]. 北京:海潮出版社,1996.
- [4] [德] 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 经济与社会[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5] [美]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 [6] 张庚麟督修. 介休县志(民国版)[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 [7] 张静. 基层政权. 乡村制度诸问题[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8] 王铭铭,王斯福. 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 [9]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0]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胡宗泽,译. 民族、国家与暴力[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1] 吴毅.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2] 陈吉元,陈家骥,杨勋.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M]. 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 [13] 刘沛林. 古村落:和谐的人居环境(代序)[M]. 上海:三联书店,1997.
- [14] 岳永逸. 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J]. 社会,2008,(6).

收稿日期 2015-01-20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陈默]

[作者简介] 郭永平(1979~),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山西太原,邮编:030006。电子邮箱:xzhgyp2012@163.com。